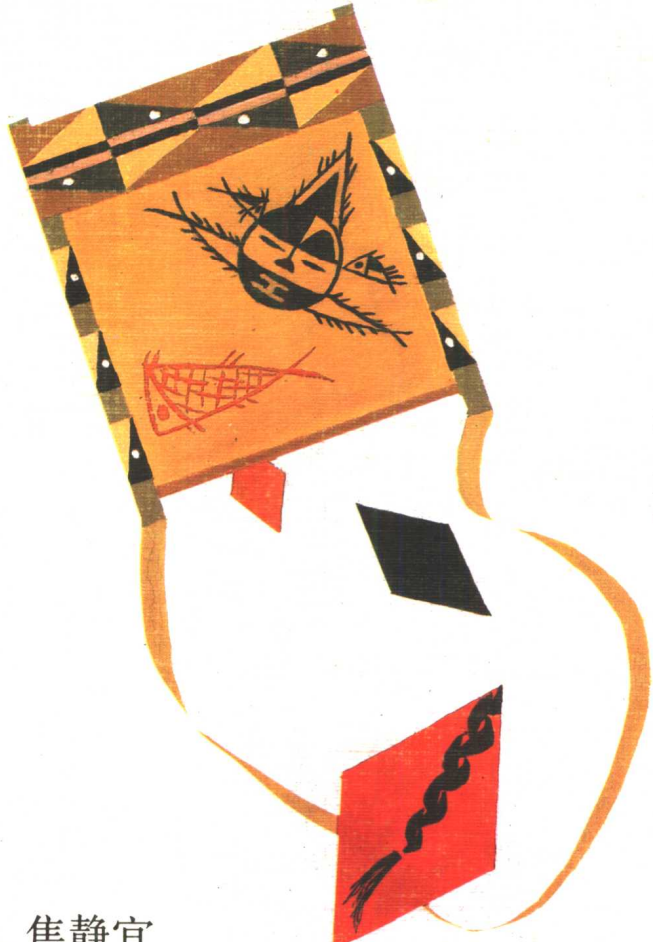


中國文化風情叢書



焦静宜

20世纪初 中国的遗老遗少

科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风情丛书

20 世纪初 中国的遗老遗少

焦 静 宜

科 学 出 版 社

1989

内 容 简 介

本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新旧杂陈的历史过渡时期。本书写出一批活跃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封建遗老遗少的特殊心态和不同命运。其中包括逊帝溥仪的奇特生涯,权监小德张的畸形心理,“大总统”徐世昌的兴衰沉浮,军阀段祺瑞的穷途末路,辫帅张勋的复辟闹剧,状元张謇的兴办实业,王族后裔川岛芳子的堕落下场……等等。

本书根据史实写真人真事,生动有趣,可使读者一睹中国社会一个特殊阶段的政治风云与历史风貌。可供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阅读。

中国文化风情丛书

20 世纪初中国的遗老遗少

焦 静 宜

责任编辑 陈菲亚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1989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960 1/32

198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5 1/2

印数:0001—30 000

字数:91 000

ISBN 7-03-001224-0/G·78

定价:1.90 元

序

中国如何才能更快地富强起来？面对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把目光和思路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的主张从中提炼出应当大力发扬的积极因素，有的立足于分析批判，主张进行深刻的反思。当然，也有不少人希望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好东西同外国古今的好东西结合起来，以构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在一种广泛的文化兴趣中，我们推出了这套《中国文化风情丛书》。

并不专攻文化学的读者，对文化问题既怀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又有点害怕正规文化学专著的深奥与沉重，能不能有这样一些书，它们不太厚，不那么学究气，读起来颇为轻松有趣，但却能传递出若干有意义的信息，引发出若干有教益的思考，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呢？我们编印这套丛书，正是想满足广大读者的上述需求。

宽泛的文化概念。应包括人类社会所创造的

全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我们无力在这套丛书中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我们找到了一个想来读者诸君定会感到兴趣的切入点，就是中国的风俗人情。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风俗，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比如我们将讲到中国人的软幽默，这就是超出一般以节日庆典及专有模式为表象的溶解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广义的风俗，再比如我们将从个人命运的角度讲到历史上帝王后妃的隐秘一面，那就是超出一般政治历史伦理道德评价的广义的人情辨析，我们希望在这种别具一格的观察取向中，使读者获得从正规学术著作中难以获得的惊奇与联想。文化既是一种广泛的存在，又是一条自远古流来并向未来流去的大河。因而对文化的考察往往也就是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我们这套丛书也许较多地从批判与反思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中国的文化风情，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总体评价上有什么先验的前提。一个具有充分自信心的人是乐于适度自嘲的。一个具有充分自信心的民族也应当不怕并乐于适度地自嘲。我们既希望这套丛书中能有若干本虽然出之轻松立足趣味但亦能达到学术专著的高度，我们也希望这套丛书中某些材料固然翔实但角度未免过于奇突立论未免过于偏激的部分能得到掩卷一笑的宽容。当然，我们欢迎无论是有关专家还是普通读者都不吝赐教，以使这

套丛书的质量不断提高。

时下世界上的书多如夏夜晴空的繁星,可读的很多,可不读的似乎更多,我们编印的这些册子不敢也不该自诩为读者必读的书,但我们确实存心良善,态度认真,想把科学性同趣味性尽可能地水乳交融,使读者在闲暇中能比较轻松地获取一些精神上的滋补,因此或许果能使拿钱买这书的读者开卷有益。是为至盼焉!

刘 心 武

1988年8月10日

于北京 安定门

目 录

序

1	过渡的时代	1
2	从宣统皇帝到“张园主人”	9
3	末代皇后婉容	24
4	宫廷内外的“小德张”	35
5	水竹邨人徐世昌	46
6	状元实业家张謇	61
7	北洋之“虎”段祺瑞	74
8	辫帅张勋的复辟闹剧	84
9	高自标榜的吴佩孚	102
10	女间谍川岛芳子	117
11	雪堂落水与观堂投湖	129
12	张少帅与赵四小姐	142
13	“落花流水春去也”	155

1

过渡的时代

又留小辫,又穿西装,中国有过这么一个奇特的时期。

20 世纪的头三十年,象一面“哈哈镜”,把近代—现代大转变中的人物面影,都反映了出来。“哈哈镜”里的影象,是光学玻璃的曲折反射,而这一时期的一些特殊人物,都有奇特的背景、变形的心态和不同的命运。

辛亥革命的风暴冲击了这个古老的封建王朝,使之在顷刻之间崩溃,社会也因之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皇帝大臣变为总统部长,翎顶褂服变为西装革履,世袭罔替变为国会选举,四方来朝变为地文割据,老爷小姐变为先生女士,子曰诗云变为声光化电,以至饮食起居无一不在变化。

就在 1912 年 3 月 5 日的《时报》上,曾发表了一首通俗歌谣,作者满怀激情地描述了社会诸般

变革的可喜景象：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足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兴了吗？——兴了。灭了吗？——灭了。

兴了吗？——没有全兴。灭了吗？——没有全灭。

真是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时代！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当历史刚刚迈进 20 世纪，中华大地还飘荡着被八国联军所制造的腥风血雨的余息，清王朝却在长期挨打之后又蒙上一层耻辱：它接受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其中一款是要四万万同胞各出白银一两来付所谓“赔款”。但是，炎黄子孙从来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筋骨来祭祀祖先，他们勇敢地教训了侵略者，使这些虎狼熊豹从企图瓜分中国的迷梦中惊醒，感到这块肥肉并不能任人吞噬。那时，清政府的主持者是一位暴戾恣睢的老嫗——

慈禧太后。她虽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女皇”之一，但却不具备唐朝武后的政治睿智，而只发展了汉代吕后的凶残狠毒。她对内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旨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对外则因仓惶西行而心有余悸，便抱着“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取媚态度。慈禧太后对内对外的种种倒行逆施，引发了人民群众各种形式的反抗，撼动着清王朝的基础而使它日趋衰朽，走向死亡的深渊。为了维持局面，在清王朝最后的几年里，曾忸怩作态地引进立宪政制、颁布宪法大纲、倡言改良政治等等，企图给人一种虚幻的向往民主的心理满足。可惜，事与愿违，广大民众没有受骗，仍然在各地掀起各种形式的反抗浪潮——抗捐、抗税、抢米风潮、革命党起义……，人们都以实际行动粉碎了伪立宪的骗局；上层士绅则借“立宪”这一资产阶级政治手段来谋求参政的阶梯，这些对延续两千年的封建体制都是一种打击和威胁。人们受到社会现实状况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不改变不得了”的心理意识。

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冥顽不灵分子笃信奉天承运，天子圣明，妄想抱残守缺，坐等“中兴”局面的出现。一部分略有见识的士大夫，一方面见到社会动荡，大厦将倾，而谋求治平之道；另一方面却不愿冲破原有的平衡，要以小变求不变，希冀以点滴改良来延续政权微弱的生命，而把某些政治欺骗手段当作麻醉剂来解除心理上的

不安。革命党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英勇地前仆后继，以求现状的彻底改变，不断在东南沿海地区组织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权。

社会上反应敏感的是多数知识分子，他们抱着救国救民的赤诚，采取病重急投医的态度，天真地向往东学、西学，向往西方文明，向往明治维新，探索救世良方。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是他们心灵上的镇静剂。由于日本地域邻近，风尚相习，所以有大批知识分子负笈东瀛，多方位的去求取治国救民的灵丹，所以 20 世纪初极一时之盛的“留日热”在某种意义上说含有爱国救国的重要内涵。当时一份名为《云南杂志》的革命刊物上有一篇文章大声疾呼道：“欲不使金碧山川黯然黯然，长淹没于腥风血雨之中；欲不使千余万文明神胄，如束如缚，呻吟于条顿、拉丁民族之下，是赖夫学，是赖夫游学。”这是当时留学救国的代表性舆论，这种心态变化对整个社会的求变思潮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后来，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中绝大部分成为社会求变的宣传者和实践者。

当时的求变心理和一些“革命”行为，虽然过于琐细和不尽符合现实，却显示出民国初年社会的一种新气象。社会风尚的种种改变确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去发辫，易服饰，改称谓和禁赌禁毒等等除旧布新的措施，不仅行之于共和国的命令文书之中，而且在逐步实行。这些政令措施触动了封建的税政与陋习，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移风易

俗的快感。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民国初年的社会仍然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很多方面同封建传统相袭相承，因而她还不是崭新的社会，还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这一过渡社会与辛亥革命前的过渡社会有所不同，其不同点在于前者希图改良旧有的封建内容，有所维新，以维护旧体制；而后者则力求引进一些西方和东方先进的政治制度，通过“洋化”而出现新的局面。

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年来封建体制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封建的基土中所培育的毒菌，仍在侵蚀着新体制的肌体，各种不同体制与风尚的引进和改革都会随时被封建的旧势力所扭曲、利用。例如议会选举会受到军阀干预和人为的困扰胁迫，总统这个民主共和国的首脑会被军阀政客所玩弄与左右。更如皖系军阀组织安福俱乐部来操纵总统的选举，直系军阀悍然以金钱收买议员而制造了为曹锟贿选总统的丑闻。在任的总统黎元洪在不适合军阀需要时可以任由军警威逼，废黜出走，甚至遭到截车逼交印玺，更被诤为奇闻……这些行径都玷辱了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但终不能否认她在体制上的进步。

与此同时，民族经济确已有所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它给中国民族经济以发展振兴的缝隙，如辛亥革命前的 1903—1908 年间，新工业公司注册者是 265 家，平均每年 44 家左

右,而 1912——1921 年注册者竟增至 794 家,平均每年 80 家,几乎增加一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棉、丝纺织染公司,1912——1914 年间仅 10 家,而 1914——1918 年增至 50 家,增加了四倍,资本额也从 321.5 万元增至 2523.1 万元,增加了近七倍。但是,封建经济势力还是相当深厚,如军阀政客以其劫取攫夺所得大肆兼并土地,加强了封建经济的基础。许多民族企业吸收了军阀官僚资本,使他们成为企业的主要东家,给企业带入了封建霉菌,甚至还有买办,洋人也插足其间。政府的重要经济命脉——关税、盐税仍然掌握在洋人手中,当财政枯竭时还要乞怜于洋人,使民众产生了崇洋心理。

随着政治、经济的崇洋倾向,生活习惯参杂西式,以“洋”为荣的观念在更多人的思想中滋生发展。吃西餐、着西装、住洋楼、讲洋话成为时髦的行为,于是“器必洋式,食必西餐”,“外国细呢,西式新衣,列肆相望”,宴客不用西餐,“不足以示诚敬”,连旅店也多“一切器具均仿欧美式样”以招徕旅客。这些报纸上的报道反映了民初崇洋风气覆盖面之广。不过,应该看到,这种崇洋心理还包含着对旧有封建社会生活方式的否定和追求新型消费途径的双重内涵意义,表现了辛亥革命后过渡社会的特点。

可惜,新的社会思想和风气由于缺乏一次雷厉风行的激荡而发展迟缓,因而给旧习俗以延续

和抵制的余地，其结果是在民国初年的“洋化”过程中，可以残存着全军保存发辫的“辫军”；可以在民主共和国的都城内保留着溥仪小朝廷，并继续朝觐叩拜，跪请圣安；可以允许儒教徒大力提倡孔教，宣扬三从四德、节妇烈女；可以任凭复辟言论漫无限制地流传，并策划实行，等等。

正是由于辛亥革命没有彻底的大变动，所以民国初年的社会自然地形成一种中西杂陈、新旧并存的奇异景象。在这一过渡阶段的社会舞台上晃动着两大类引人注目的并变幻着政治色彩的人物：一类是辛亥革命后的胜朝臣民；一类是兔起鹘落的北洋军阀政客。他们被民众目为遗老遗少，以各自不同的人生观点指导自己的行动，安排自己的生活，规定自己的命运。归纳起来不出这两大范畴。一种是识时务而顺应潮流的发展，弃旧图新：有的虽成为民国新贵，但昙花一现，不过是历史的过客；有的则历经宦海沧桑，投身社会事业，兴厂办矿，改变自己的轨迹，成为新事业的主宰；有的熙来攘往，争名夺利，时而失势，时而再起；有的力求摆脱旧的束缚，立异求新，忧国忧民，可惜壮志未酬，抱恨终身。另一种是逆潮流而动，抱残守缺：有的时刻不忘失去的天堂，以恢复祖业自励，以致觐颜事敌，不惜扮演儿皇帝的丑角；有的自恃贵胄华族，顽抗民国，奔走呼号，甚至认贼作父；有的鸣锣响鼓，袍笏登场，重演前朝故事；有的自作多情，一死以报君主；有的遁迹林下，或皈

依佛道，祈福来生，而终难逃天网；或托庇列强，寄人篱下，没没以终……

过渡性社会中的过渡人物浮沉在中国 20 世纪初的人海之中，这些 20 世纪初中国的遗老遗少，为后人留下了堪为玩味的雪泥鸿爪。选择他们的若干足痕，观察它的肌肤纹理，或作龟鉴，或资谈柄，应当胜似听白发宫女的忆往谈旧吧！

2

从宣统皇帝 到“张园主人”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了 1911 年，皇帝没了。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国君。他 3 岁登基，6 岁退位，是个名符其实的“小皇上”。溥仪退位经过了极大的周折，最初曾有以良弼为首的一帮遗老遗少，组织过“宗社党”，头上垂着小辫，竟然侈谈“革命”，无非为了保住皇族宗室的特权。但良弼因革命党一个炸弹而丧命，这帮遗老遗少也就树倒猢猻散了。

尽管帝王统治已经告终，但这位逊帝却依然享受着民国政府特定的“优待条件”，紫禁城依然是国中之国，那些遗老遗少，民国显贵，仍然对他行三拜九叩大礼，俯首尊君称臣。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话，叫作“关起门来做皇上”盖出于此吧！逊



溥仪与婉容

帝的深宫生活一眨眼过了十二年。1924年，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溥仪被驱逐出宫。他在天津做了七年寓公后，被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汉奸共同挟持他到长春，成为伪“满洲国”执政。溥仪认贼作父，甘当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儿皇帝，是因为长期的逊帝生活使他